

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

——论网络世界中的身体、道德和教育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网络空间是非物质性的, 物质化的身体在网络空间中退隐了, 与此同时, 与身体相连的身份也消失了, 由此导致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是一种无实体的交往。网络空间中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始料不及: 缺乏身体的道德担保导致网络生活中的伦常松懈和言行粗鲁; 无身体的网络相遇之脆弱导致人际关系的短暂、肤浅和相互间义务的淡漠; 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近中远”与责任的飘零。教育作为弱势存在, 网络空间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是其无法承受之重。教育明智的选择是先考虑在网络盛世如何自处, 然后才是调整自身, 力所能及的弥补网络生活的道德后果。

关键词: 身体退隐 道德后果 网络世界 教育

一、网络与身体的退隐

人始终是以血肉之躯委身于世, 身体是人的物质实体, 是人不可逃避的宿命。但人又是精神性的存在, 所以物质性的身体在有些时候就成了精神性的人的累赘。在一定意义上, “躯体是深刻的悲哀之源泉”^{[1]P146}, 因为身体不能像精神那样插上翅膀, 无法跟上精神的速度和高度; 而且, 身体比较脆弱, 感冒发烧是免不了的事情, 且存活周期是有限的, 死亡必将不期而至。所以在漫漫史途上, 人们创造了神话、宗教、艺术等多种多样的文化艺术形式来表达摆脱身体的欲望和冲动, 渴望“精神蝴蝶”能够飞离“身体树梢”。但这种摆脱始终说不上成功, 因为“精神蝴蝶”的飞舞总是短暂的, 终归要在“身体树梢”上停靠。如今, 一切都不同了, 因为有了网络, 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将身体放在括号里”^{[2]P103}。

身体之所以能够在网络空间中退隐, 原因在于网络空间的非物质性。网络空间是一个数字化的空间, 其最基本的元素不是传统物理空间的原子, 而是“比特”, 由此造就了网络空间的典型特征——非物质性。而人的身体却是物质的, 与网络的非物质性格格不入, 所以非经特殊的“加工”, 身体是无法进入网络的。非物质化的网络以信息化的方式展现世界, 从人们所能认知的一切过程中抽取信息, 使之符号化。而信息一旦从原过程中抽取出来, 就变得独立于原过程, 可以被任意地存储、组合、加工。^{[3]P69-79} 人要想进入网络空间, 也需要经过这一信息抽取过程。也就是说, 进入网络空间的是经过符号化加工的人, 是不承载着笨重身体的信息符号。所以迈克尔·海姆形象地指出, “悬浮在计算机空间当中, 网络行者摆脱了肉体的牢笼, 出现在充满数字情感的世界中。”^{[2]P91}

在符号世界中存在对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物质世界之外建造一个符号世界也正显示出人的高明。约翰·奥尼尔曾认为“任何社会都不能将活生生的身体从其符号体系中排除出去, 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正是通过身体来交流诸如年龄、婚姻状况、性爱的可能性、社会地位等信息。”^{[4]P11} 比如, 姓名是人的符号化表现形式, 但姓名这一符号与特定的身体保持着对应性的联系, 借助姓名这一符号, 我们很快可以将符号背后的身体形象想象出来。但在网络已经弥漫到人类生活的所有“褶皱”的时代里, 这话就有点绝对了。网络这一由比特构筑的世界里没有人的身体, 只有已经与身体切断联系的符号。在现实世界中主体是感性

的、生物的人，主体间可以直接感知对方的存在，但在网络世界里，主体只是一串串符号，我们很难通过这一串串符号查找到其“所指”的人及其身体。因为网络世界中的符号虽然是人的网络化身，但“我的网络化身不是生物性、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完全非物质的智力创造。”^{[6]P13} 也就是说，我们在网络空间中的化身与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符号不同，不是我们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反映，而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智力创造。作为智力创造的结果，网络化身虽然由个体“裂变”而成，但因为是裂变，所以与个体的联系却是脆弱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换或丢弃。

与身体退隐相联系的是身份的退隐。在人的社会属性中，与身体最亲近的恐怕是身份了，因为身份的一端连着人的身体，另一端连着社会地位。身份的“身”指身体及由身体的来源所派生的社会标识，如出身、籍贯（“出身地”）、性别、年龄等；身份的“份”（分）指由身体出身及身体生长（包括个人努力）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归类。作为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中介，身份起着标识自我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借助身份来说明自己是谁的，没有身份，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楚自己是谁。但在网络中，身份也与身体一起消失了。这里的身份指的是真实的社会身份，而不是指网络身份。进入网络空间的人都有自己的网络身份，但这种身份只是真实社会身份的遮盖物，正是通过这些网络身份的遮盖，人的真实社会身份才得以退隐。网络身份之所以可以遮盖真实的社会身份，在于其虚拟性。因为是虚拟的，所以可以无休止的切换：一会儿我是男人，一会儿我又是女人；一会我是学龄儿童，一会儿我又是古稀老人；一会儿我是面朝黄土的农民，一会儿我又是大学教授，谁知道我是谁呢？

伴随着身体、身份退隐的是交往的变异。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交往是与物理世界中完全不同的新的交往方式：你的符号与我的符号相遇，你的影子与我的影子相逢。借助符号进行交往，对人类来说并不新鲜，比如，未曾谋面的人同样可以通过书写符号进行交往。但书写的符号是“有主”的，即使未曾谋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其与某人的之间确定的联系。但网络上的符号、影子已经是“断了线的风筝”，我们无法通过它找到“放风筝的那只手”。马克·德里将网络空间中发生的这种交往界定为“无实体交流”^{[6]P3}。于是，一种交往的奇观出现了：在网络的天空中，是“断了线的风筝”在搭讪、聊天、倾诉、争吵、谩骂，而不是“放风筝的人”在交往和交流！

二、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

一直被视为人之赘的身体在网络的天空中被卸载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欢呼雀跃，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伴随着身体退隐的是始料不及的道德后果。

1. “无实体交往”与“火焰战争”

电影《隐形人》中的男主角是一个科学家，因为找不到隐形药品的被试，就亲自上阵注射了自己发明的隐形药。实验是成功的，但隐形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原来追不到的姑娘现在可以轻易到手了，原来无法获得的财富现在可以轻易获得了……他发现原来所有不能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做了，所以他拒绝同事结束实验而恢复真身，最终导致了可怕的灾难！电影富有哲理：原来被我们视为累赘的身体是我们行为的道德担保。没有了身体的担保，人们很快变得行为放纵、为所欲为。齐格蒙特·鲍曼认为，身体是人们内心野蛮人性的监狱，“每一个现代的身体是一种监狱，每个现代人都是监守着内部那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的狱吏，而这些狱吏的职责是锁上栅栏并使警钟长鸣。”^{[7]P164} 将身体视为内心野蛮人性的“监狱”，似乎有点粗糙，但话“话糙理不糙”。因为人性中有善有恶，但无论是善还是恶都与身体密切相关。所谓“修身养性”实际上就是通过身体扬善而止恶。没有了身体的约束，人性和道德也就失去了担保，人性中的恶就会堂而皇之的到处游逛。

这一道德后果在网络世界里的典型表现是“火焰战争”（flame war），即“无休止的在

线交锋和电子谩骂”。^{[6]P1} 在网络空间发生的交往是身体退隐的“无实体交往”，一个个网络化身既是符号，也是易燃易爆的火苗，动不动就会点燃、爆炸。即使在现实世界里很有教养、脾气很好的人，在网络空间中也可能变成一个火药桶，原因何在？在现实生活中，引起我们不快的事情也很多，但碍于“情面”（自己和对方身体性的存在）和后果（身体要承担）而自我调控、自我消解。但在网络世界里，身体退隐了，既无情面可讲，也不需要承担后果，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谩骂他人。“‘固态的’现代性是一个相互承诺的时代。而‘液态的’现代性却是一个解除承诺、捉摸不定、熟练地逃避和没有希望追求的时代。”^{[8]P189} “固态的”身体在网络空间中化为比液体还具有流动性的“网络气泡”，道德的承诺更彻底地解除了。人们之所以这么热衷于网络，不能说与网络世界的身体、身份退隐无关，问题是“在身份变得流动的场所，我们所熟知的关系和义务还有存在的可能吗？”^{[9]P48}

如前所述，作为“无实体的交往”，发生在网络空间的交往是你的符号与我的符号、你的影子与我的影子的交往。正是这种缺乏身体担保的交往方式决定了电子谩骂的动辄爆发。但我们应该客观地承认电子谩骂对网络行者所造成的伤害没有现实世界中的辱骂那么严重。在现实世界中，骂人者的声音、语气清晰可闻，动作表情清晰可见，直接指向被骂者的身体及这个身体所承担的整个人，对被骂者的身体、心理、人格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而网络空间中的电子谩骂，无声、无形，只是一串串的文字和符号，且不是直接指向被骂者的身体和本人，而是其在网络中的符号化身，是有缓冲的间接辱骂，所以“力道”锐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对道德的腐蚀作用。且不说网络空间的沉溺者，他们往往会因为混淆虚拟与现实而将在网络空间中养成的谩骂成习惯带到现实世界之中。就普通的网络使用者而言，由于网络的生活重要性增加，在这一空间中形成的行为恶习同样有迁移到现实生活的可能。另一方面，对很多人而言，网络空间已经是可以与物理世界并驾齐驱的生活场域，在这一重要的时空环境中频繁发生的“火焰战争”腐蚀的正是人的道德感！

2. 相遇的脆弱与义务的淡漠

“漂”在网络世界，我们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遇到的“人”可能多过我们的先辈一生所遇到的人。这是网络技术给我们提供的交流便利，但我们不能忘了，技术往往有“两手”：一手给予，一手索取。在网络这一人造的世界里，技术索取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的直接交往。也就是说，我们交往的广泛性和密度空前增加，但不幸的是交往的质量却不可避免的下降低了。网络空间里没有身体，没有面孔，而“活脱脱的非象征性的脸才是责任的源泉，才是人与人之间直接温暖的联系。不直接在物理空间中与他人见面，我们的伦常也就松懈了。”^{[2]P105}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切都是“无实体交往”惹的祸：我们的网络化身也就是我们在这一虚拟世界中随意创造的“气泡”，与人的活脱脱的脸庞富有情感不同，它只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温度的符号，我们和他人都不太可能为这五花八门的幽灵般的符号付出真情。社会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联系有强纽带（**strong tie**）和弱纽带（**weak tie**）之分。“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带。”^{[10]P445} 纽带之所以“弱”，就在于这种纽带的表面、脆弱、低质。

网络世界交往质量的下降，还表现在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相遇没有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化身此刻相遇了，但再次相遇的可能非常小。人们相遇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对“我们还会相遇吗？”^{[11]P59} 这一问题的自动化、无意识的思考。两种答案，两种生活。如果确信还会相遇，即使不喜欢对方，我们也会找到共处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给别人留有余地，就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确信没有再次重逢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还有投入感情、委曲求全呢？网络化身多种多样、变幻无常，我们无法发现这些化身背后的身体和人，重逢的机率非常小，更何况即使重逢，我们也无法认出彼此！一个借助符号且没有未来的相遇，我们能够奢望其有深度和质量吗？

技术所要索取的代价不尽于此。“网络降低了我们与他人不期而遇的机会。”^{[12]P15} 如今，借助于发达的网络，以前很多需要亲历亲为的事情足不出户就可搞定，甚至可以在家上班、上学。方便是方便，代价也不小：我们能够与远在天边的人借助网络聊天，却很少与同一个城市、街道、小区的活生生的人直接照面！甚至对自己的家人，我们也越来越冷淡，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人也快被我们遗忘了。一项统计显示，在网络发达的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天花 6.43 小时接触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而与家人沟通的时间平均每天只有短短的 14 分钟！^{[10]P413}

网络世界的相遇充满了变数，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无助会产生大量具有攻击性的能量。”^{[11]P63} 这些“攻击性的能量”在网络世界往往以前文所述的电子谩骂的方式发泄出来。面对不确定性，另一种策略则是逃避。凡是在网络世界走过几趟的人都知道，网络上的人际相遇是何等的脆弱，一言不和，要么“大打出手”，要么“就此别过”。在现实世界中，认识一个人，且不说其身体是一个客观存在，就是其形象在我们脑海里也是难以磨灭的。即使不喜欢一个人，我们也无法做到让其马上消失，所以最明智的选择是多一些容忍和担待。网络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与一个人的化身相遇的同时已经在准备着随时离开。“网络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为了沟通，也是为了获取位置，以便脱离沟通（outcommunicate）。 ”^{[10]P84①} 在这方面，网络又玩了一个“两手”：既为我们提供交流的便利，也为我们脱离交流提供技术支持。表面上看，网络为我们建构了新的社会联系网络，但这个网络的最大特点是其不确定性，时刻都在变幻，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

在“网络沙漠”中不可能建立起固若金汤的人际关系。既然如此，“‘立即满足’看起来就像一个诱人的合理选择。无论生活可能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让这些好的结果此时此刻就立即出现吧。”^{[8]P252} 如果说在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世界里，“至死不渝”、“白头到老”式的忠诚是最可褒奖的品质的话，那么，在一个变动不已的世界了，“满足之后就分手”是一个明智的生存法则！在这种生存法则的指引下，网络世界的人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伦理境地：“与长达数千年的传统引人注目不同的是，今天，人们憎恶、躲避持久性的东西，并珍爱短暂性的事物。”^{[8]P20} 流动的网络遵循的是一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10]P245} 文化，它在创造难以估计的短暂交往的同时，也在破坏着一切持久的义务和永久的价值。网络生活教会网络行者不要将自己“固定”在任何网络化身上，不要相信任何人，不对任何人承担长久的义务。

3. “近中远”与责任的飘零

“责任，这栋所有道德行为的建筑物，拔起于他人接近（the proximity of the other）的地基之上。”^{[13]P240} 从形上的角度看，道德的“原初情景”^{[14]P159} 是“面对面”的领域，正是他人的面孔，使我感受到一种爱的冲动、责任的承担。所以鲍曼认为道德符合“视觉法则”，“由于不可解脱地同人与人的接近拴在一起，道德看起来符合视觉法则。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达到消失点，并逸出视野之外。”^{[13]P251} 从人类个体的角度看，从生命的最初一刻开始，我们就被父母的亲近所包围，关心我们的健康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他人呵护我们、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绝非仅仅出自某种私己的快感，毋宁说这是一种人类的关爱传统（tradition of caring）；成年后的我们也往往将此种我们曾经享受过的关爱回赠给下一代。这是社会得以成立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4]P8} 父母之所以对我们有责任和爱，是因为我们与父母的遗传、生理最接近，同样，我们之所以对子女有责任和爱，也是因为我们与他们最接近。因此，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责任和道德都是以社会接近为基础的，“接近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就是接近”^{[13]P240}。

①由此看来，一些所提纲的“网络实名制”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因为实名制是反网络的，既与网络的本性不符，也与大多数网络行者的需要相悖，强行推行的结果只能是毁灭网络。

接近意味着责任，反过来，距离和隔绝则意味着责任的飘零。“责任的消解，以及接踵而至的道德冲动的淡化，必然包括了（实际上，是同义于）以身体或者精神的隔绝来代替接近。……一旦接近被腐蚀掉，则责任将归于沉寂。”^{[13]P240} 距离是对道德之视觉法则的冲破，远方的人超出了我们的“视力范围”，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存在，我们对其没有亲近感，我们不会为其“烦神”（海德格尔用语），哪有责任可言^①？距离是“远”，而隔绝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远”。所谓隔绝，就是在事物或者人之间植入中介物、障碍物，使“近”变“远”。即使在物理距离上很近，但因为有障碍物，我们看到对方，同样为“视力”所不及，责任也就无从谈起。距离和隔绝对责任的消解，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是因为没有亲近，从消极的意义上，则是因为没有后果。我们对远方的陌生人之所以没有责任，还在于我们的行为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的行为的作用力离他们很远，中间有很多中介物，我们想象不出会对他们产生什么作用。

网络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以其强大的技术能力克服了距离对人类交往的阻碍，使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变成了“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但仔细揣摩，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网络所给我们带来的“近”与以往我们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是一种“近中有远”的“近”。首先，网络上的接近是我们网络化身之间的接近，符号之间可以靠得很近，甚至可以纠缠在一起。但“遥在”的身体却很远，甚至不知道其在哪里。与身体的远相联系的是人的远。我们的化身很近，但我们却无法知道对方的身体以及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性别、出身、身份、经历等等，一句话，我们还是无法靠近这个人。其次，网络相遇是一种接近，但网络相遇的脆弱则是一种“远”。亲切内在的包含这种关系的稳定，父母子女间的亲近，实际上内在地标明这种关系的一生一世性。而关系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疏远。如前所述，网络中的人类相遇是一种脆弱的相遇，是一种“弱纽带”关系，相遇的双方在相遇的同时随时准备离开。也就是说，网络上的“联系是以不联系为前提”^{[11]P153}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网络空间的“接近是以不接近（疏远）为前提”的。

网络交往中的“近中远”还表现在网络交往与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不同，是一种有中介的间接交往。“麻醉躯体”的一个简单有效地步骤就是“剪断躯体与躯体之间的当面联系，用“机器充当躯体之间的中介物。”^{[1]P178} 有中介的交往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电话。但电话的中介是不彻底的，借助电话进行沟通，我们虽然看不到彼此的身体，但可以听到确定的身体发出的声音。而网络在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它屏蔽了彼此身体的所有信息。人类在历史上发明的交通工具都具有运载身体和人的功能，以实现社会接近，而如今的“信息高速公路”则不需要运载身体就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近。但这种接近是以网络的中介和隔绝为代价的：我们都在网，离得很近；我们无从相见，不知对方身在何方，又离得很远！

“近中远”的另一种表现是“乐群（Community）”与“索居”（Alienation）^{[3]P78}的悖论性相伴。很多人在网络空间中积极活跃，乐于参与各种网络社区，表现出一种乐群倾向。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对周围的人，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索居倾向。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中的生活已经对现实生活有了较大幅度的反射，或者说，网络空间中不可靠的近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疏远为代价的。由于网络的存在，很多人愿意与机器打交道，与网络机器上的化身交流，结果是生活在同一个屋脊下的人交流的密度大幅度减少，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近中有远，说近实远，这就是网络带给我们的悖论性的生活。适应能力超强的人们，

^① 需要说明的是，亲人之间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会牵挂不已，这似乎克服了距离对责任的分解。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常情，但也应该承认这是一种“远中近”的现象：虽然远在天边，但因为遗传上的无限接近和曾经的身体、生活接近而形成情感亲近，不会因为物理距离而飘零。也应该认识到，即使是亲人，也会因为距离而产生疏远和责任的淡化。

已经可以在网络的天空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但这种适应是有代价的，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则是责任的飘零！

三、教育：无法承受之重

在一个教育倍受关注的时代，我们有从教育中为一切社会问题寻找答案的冲动。网络作为人类的时代遭遇，其道德后果是需要整个时代共同承担的。教育作为倍受关注的领域，也是相对弱势的领域，同样面临着网络的冲击。冷眼观潮，首先不是教育消化网络中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的问题，而是教育在网络盛世如何自处的问题。

1. 身体能够在教育中退隐吗？

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教育问题多多，网络的出现，使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一些乐观主义者期望将现实的教育网络化，现实教育的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比如，很多人认为，网络化的教育可以解决教育资源的稀缺问题，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为更多的人所共享，因为网络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一个名师可以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学生；网络化的教育可以解决困扰我们许久的师生关系不平等问题，因为在网络空间中师生可以与教师平等对话……

这里就有一个网络盛世教育如何自处的问题。如何自处，系于如何理解自身。两种理解，两种选择，两种道路。如果我们将教育理解为知识传授、信息传递，教育当然可以完全网络化，因为网络化的教育将使知识传授、信息传递的效率大大提高。如果将教育理解为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传递，还包括心灵沟通、情感交流、精神际会、道德熏染、经验分享……那教育就不能完全网络化。因为网络化的教育或者说教育的网络化同样使身体退隐，而身体的退隐使教育的这些追求都无法达成。

一直被我们“看不上眼”的身体实际上是人类体认世界的“眼睛”。人类祖先是自己的身体出发来认识宇宙世界的，即世界的拟人化，“如果太初之时我们的祖先不将大千世界拟人化并驯良化，他们可能早已死于对世界的恐惧。”^{[4]P17}我们可以从语言的遗存信息中找到一些证据，比如山有“顶”（头顶）、“腰”、“脚”，湖有“心”，泉有“眼”，果有“肉”，树有“干”（躯干），天有“体”，地有“貌”……人类对自然的体认要借助身体，对人化世界的建造也是以身体为尺度的，比如，房屋是身体居住的地方，床是身体睡觉的工具，车是运载身体、代替双足的工具，衣服是包裹身体、温暖身体、装饰身体的工具……总之，身体是人最方便、使用、有效的认识世界的“眼睛”和工具，正是借助这双“眼睛”和这件工具，人类才“看见”了世界、建构了世界！不仅如此，人直接借助身体建构个体自我，身体是自己的“家”。虽然自我不仅仅是身体，但没有身体，就没有自我。没有身体，自我“无处安身”，没有身体，自我也无从表现。人们表现自我最简洁有效的方式就是操作身体，通过身体动作将自我展示出来。我们正是通过他人的身体及其动作理解他人、反观自我的，他人对我的认识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身体是人际沟通、人际互动的“第一通道”。

正是因为身体的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以往的教育都是有身体的，或者说都是身体在场的。如果教育网络化了，也就是说，教育中身体退隐了，知识和信息传递以外的教育追求还能实现吗？第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网络空间中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包括伦常的松懈、人际的粗鲁，义务的淡漠、责任的飘零，同样必然伴随网络化的教育，那教育的道德追求就要蒙上浓重的阴影。再一个问题是，教育的网络化使以往教育赖以生存的师生、生生之间的面对面互动消失，使人际交往的“第一通道”关闭。康德所说的，“人只有通过人，通过同样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教育”^{[15]P5}似乎遇到了挑战，因为在身体不在场的网络化教育中，人不再是通过人来实施教育和接受教育，而是通过网络（机器）来实施和接受教育。制度化教育产生以来，师生之间的互动始终是教育运行机制的核心，失去这一核心的网络化教育，还是我们所理解的本来意义上的教育吗？我们冀望借助教育实现的心灵沟通、情感交流、精

神升华、文化薪传等愿望恐怕就要落空。如前所述，个体一出生，父母就其呵护有加，正是在“肌肤相亲”中，关爱的种子生根发芽。学校生活中师生、同学面对面的互动，是家庭关爱传统的延续，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肌肤相亲”。如果学校教育网络化，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离开家庭（家庭也在不同程度的网络化）就被“抛”进没有身体接近的网络世界，关爱的种子是否能够生根发芽真是值得怀疑。

因此，面对网络盛世及其道德后果，处于弱势地位的教育首先应该做的是如何自处，或者说是如何坚守自己的身体性。网络时代的教育不是反网络的，对网络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积极利用网络；同时，网络时代的教育又不是“随网逐流”的，有自己的立场和坚守。坚守身体在场，是网络时代教育的第一道防线。在此基础上，教育才谈得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弥补网络世界因身体退隐所衍生的道德后果。

2. 无法“修身”，如何“养性”

在网络盛世，什么事情都要与网络沾边。同样，在道德教育领域，有人就早早提出了“网络德育”的命题。问题是，网络世界是身体退隐的世界，无法“修身”，那如何“养性”？网络是人类的一个新的存在空间，网络生活是人类新的存在方式，我们承认在网络空间中存在对人有道德上的副作用的同时，也会对人积极的影响。但这种积极的影响就是“网络德育”吗？如果这就是网络德育的所指，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有没有这个名称，其对人的影响都会持续发生。如果将网络德育界定为通过网络进行的道德教育，那这种“有意识的德育”就会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就是“谁进行网络德育？”或者说谁是网络德育的实施者。先看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学校等教育机构可以建立网站，但建立网站与建立学校不同，因为你无法借助法律让适龄人员必须像就学一样去浏览网站。即使学校所建立的道德教育网站再好，去访问的人可能也不会太多，因为几乎没有人上网的目的是接受道德教育。网络世界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主义。人们进入网络空间的主要动机是消费、创造、破坏信息进而获得娱乐性的满足。如果一个网站摆明了要对人进行道德教育，显然是与网络世界的逻辑对抗，其命运可想而知。与此相反，建立各种看起来与道德教育无关的专门网站，间接对来访者产生影响，或许是一个明智一点的选择。机构不是人，不可能自己进入网络世界，必须由机构中的人，比如教师，代表机构进入网络空间。这又有两难：如果进入网络世界的教师采用实名的方式，那认识的人肯定会避而远之，导致教师很难成为网络德育的实施者；如果教师采用隐身的方式，由于在网络世界中身体、身份退隐的，谁又能保证隐身的教师还能扮演教师的角色呢？谁能保证其不会参与“火焰战争”、“电子谩骂”、“网络械斗”呢？即使一个教师的操守或技术手段足以保证其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坚守教师的社会角色，在网络空间中又有谁会相信他呢？

第二个矛盾是“谁是受教育者”，或者说“谁是网络德育的对象？”如前所述，进入网络空间之后，我们的身体、身份都退隐了，在网络世界里我们无法分清谁是教师，谁是学生。进入网络世界的学生就像跃入大海的鱼儿、飞入天空的鸟儿，我们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身影？因此可以说，所谓网络德育是无对象的，无法指向任何确定的人。没有确定的对象，网络德育还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德育吗？

通过网络进行的网络德育，虽然时髦，但却不具有现实性，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缺乏身体的“通道”。

3. “堤外损失堤内补”

网络世界中身体退隐的道德后果是时代的遭遇，需要整个时代来承担，作为弱势存在的学校，根本无法一力承担。但这并不意味着安顿好自身的学校不能有所作为。站在实体社

会的立场，从道德的角度看，网络生活的道德后果如果是一种“堤外损失”的话，调整好自身的学校起码可以作为“堤内”给予适当的补救。

处在网络风雨之中的教育，要想在弥补网络的道德后果上出一份力，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教育的自我反省。“所谓‘学习’，就是跟客观世界的交往与对话，跟他人的交往与对话，跟自身的交往与对话。……可以说是，‘构筑世界’、‘构筑伙伴’、‘构筑自身’的实践。”^{[16]P20}但现实的教育显然不是秉持这种全面的学习观，而是将教育和学习仅仅聚焦于客观世界，仅仅“构筑世界”，抛弃了“构筑伙伴”和“构筑自身”。教育如果回归本意，在运行过程中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持久的交往和对话关系，不正可适当弥补网络交往中的短暂和疏离关系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吗？如果教育能够回归本然，在教育过程中使每个人建构好自身，学会与自己交往和对话，不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空间中迷失自我、动辄着火的缺陷吗？我们承认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根本不同，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质不可能完全迁移到网络空间之中，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真正的德性所具有的穿透力和持久性。

很多人在网络空间中遇火就着，如前所述，主要是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导致缺乏身体的道德担保，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和受教育的过程中压抑、受伤得太久了，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网络则提供了这种出口。教育执着于外部的反映世界的知识，教育的过程就是对客观知识的竞争性学习的过程，教育关系粗化为“伤害和受伤的关系”^{[16]P195}。对不少人来说，受教育的过程，也是身心受到伤害的过程。以往，受伤的身心无处发泄和修补，因为身体就是“看守”，如今有了网络，身体退隐了，所以这些受伤的身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火焰战争”。因此，教育如果能够回归本意，使教育关系由“伤害与受伤的关系”转变为“关爱与被爱”的关系，不正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世界中伦常松懈与言语粗暴的道德后果吗？

网络在现实社会蔓延的越来越广泛，对现实世界的渗透也越来越深入，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人们沉浸在网络空间的机会和时间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长时间的耽于脆弱的相遇和说近实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持久、确定的、亲近的人际关系的饥渴将更为迫切，置身于实在世界的教育如果能够满足人的这一需要，既可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的道德后果，又可为自己挣得一片天地。佐藤学认为教育本有两面，一面是“education”，一面是“edu-care”。前者以儿童为客体，成人能动的施加影响；后者以成人与儿童的交互作为为核心，互为对方而操心。由于工业化的需要，“education”的功能被抽象出来加以制度化，形成现代学校教育，而“edu-care”的功能则被密封在家庭教育之中。^{[16]P190}如果学校教育能够恢复“edu-care”的功能，使关怀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之中，当可缓解因网络的蔓延所导致的社会疏远。针对现代学校知识化、客观化冰冷，很多学者已有改造方案，比如，马丁提出用“3C”，即“关爱（care）、“关切”（concern）“关联”（connection）代替过去的“3R”（读、写、算）。^{[16]P196}针对学校教育已经异化为残忍的学术训练，诺丁斯提出“教育最好围绕关心来组织：关心自己，关心身边的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有各种关系的人，关心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关心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来的物品，以及关心知识和学问。”^{[17]P3}所有这些为教育添加情感色彩的思想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网络的欠缺的，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是对时代需要和教育问题的智慧反映。面对网络时代的道德后果，我们更应该在他们已经指明的道路上更加坚定的走下去。

参考文献:

[1]南帆.躯体的牢笼[A].汪安民.身体的文化政治学[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2000.

[3] 段伟文.网络空间的本质论[A].王文宏.网络文化研究[A].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4] [美]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5] [美] 威廉·J·米切尔.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M].范海燕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 [美] 马克·德里.火焰战争[A].王逢振.网络幽灵[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7] [英] 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译.南京:学林出版社,2002.

[8] [英]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9]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 [美]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 [英]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卞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 [美]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民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13] [英]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4] [法] 艾玛埃尔·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M].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5] [德] 伊曼努尔·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6] [日] 左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7] [美] 内尔·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The Moral Aftermaths of Body-absence

The essay on the Body, Moral and Education in Network Space

Gao Des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Network space is an incorporeal space where the materializing body can be easily hidden and at same time, the personal status is unidentified owing to this sort of body-absence. It leads to a fact that the communication in network space turns out to be a non-substantiality communication. The moral aftermaths of body—absence in network space is out of calculation: the moral is lax and the communication manners are rude in network spac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moral guarantee. The mutual obligation is indifferent the nature/feature of non-identification and fragility reduces the very relationship into a temporary and superficial link with the neglecting of moral obligati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network space seems to be close but estrange in fact and many basic moral responsibilities are inclined to be discarded. These kind of moral aftermaths of body—absence in network space are increasingly loading a burden to the shoulder of our weak education. To current

education, the advisable choice is manger to survive in such an environment, and then figure out how to make some redeem within its reach by adjusting itself to this highly developed net-dominated (or net-oriented) society.

Key words: Body-absence Moral Aftermaths Network Space Education

作者简介: 高德胜,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副所长。主要从事道德教育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08-04-05